

李树青生平与伊黎、魏尔万合著之《土地经济学》的中译

张清勇^{1,2}

(1.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 北京 10087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 北京 100836)

摘要: 研究目的 探讨李树青的生平和他翻译伊黎与魏尔万合著之《土地经济学》一书的经过。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法。研究结果 李树青将伊黎与魏尔万合著的《土地经济学》翻译成中文, 是中国土地经济学界的一大盛事。研究结论 李树青在中国土地经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 李树青; 《土地经济学》; 伊黎; 魏尔万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158(2009)10-0074-06

Introduction on Lee Shu-Ching and His Translation of the *Land Economics* Co-authored by Ely and Wehrwein in Chinese

ZHANG Qing-yong^{1,2}

(1. Department of Land and Real Estate Manage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IFTE of CAS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life of Prof. Lee Shu-Ching, and discuss his translation of the *Land Economics* co-authored by Ely and Wehrwein in Chinese. Method of documentation analysis was employ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t is a spectacular event that Lee Shu-Ching translated the *Land Economics* co-authored by Ely and Wehrwein into Chinese for the field of Chinese land economics. It is concluded that Lee Shu-Ching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land economics in China.

Key words: Lee Shu-Ching; *Land Economics*; Ely; Wehrwein

1 引言

李树青(Lee Shu-Ching, 1906—?)是著名的土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两度赴美留学,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土地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因日本侵华而归国参加抗战,抗战胜利后,又到马里兰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求学和研究,1950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高校任教近30年。李树青秉承了威斯康星大学土地经济学的传统,先后在土地经济学开创者伊黎(Richard T. Ely)教授的高足魏尔万(George S. Wehrwein)和贝克尔(Oliver E. Baker)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和研究土地经济学,是中国早期获得土地经济学学位的学者之一,在中国土地经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收稿日期:2009-03-25

修稿日期:2009-07-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773117)。

作者简介:张清勇(1980-)男,福建金门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学和住房市场。E-mail: qingyongzhang@hotmail.com

更为重要的是 20 世纪 40 年代初,李树青将伊黎和魏尔万于 1940 年合写的名著《土地经济学》翻译成中文,是该书的第一个译本。这是继 1930 年章植先生以伊黎和莫哈武(Richard T. Ely and Edward W. Morehouse)1924 年合著的《土地经济学要义》为蓝本撰成《土地经济学》一书之后,中国土地经济学界的又一盛事,再开中国土地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新风。其后在中国各大学执教的土地经济学家出版自己的专著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该书的影响,如张丕介的《土地经济学导论》、吴文暉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等^[1]。本文尝试探讨李树青先生的生平和他翻译《土地经济学》一书的经过。

2 早期求学和研究

李树青生于 1906 年,辽宁凤城县人,1923 年考入凤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安东商科中学任国文教师^[2],1930 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35 年毕业^[3]。他在清华的几年,正是清华社会学系的鼎盛时期,“这时由陈达(通夫)先生担任主任,讲授人口及劳工两课。潘先生则开家庭、社会思想史、优生学等课程。翌年吴景超先生自南京金陵大学来授都市社会学、犯罪学及研究方法。李景汉先生则自定县平教会来指导社会调查。在所有学术领域中都是一时之权威人物,享有盛名。”^[4]他得益于吴景超先生的指导,“一入大学,即选习吴先生的课程,此后四年肄业期间均在吴先生指导下从事研习,熏陶渍染,受益良多。”^[5]期间,他发表了数篇文章,如《逮捕学生感言》登于 1935 年第 143 期《独立评论》,《中国农村崩溃中的人口因素》载于 1935 年 2 月 3 日《北平晨报》,《中国农民的贫穷程度》刊于《东方杂志》1935 年第 32 卷第 19 号等。

1935 年,李树青参加第三届留美考试,应考的主题是“土地问题”^[6]。通过后,于 1936 年 8 月 19 日放洋,前往指定的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留学。在美期间,他在魏尔万教授(土地经济学开创者伊黎教授的高足,伊黎在自传中认为他是继承其土地经济学衣钵第一人)的指导下学习土地经济学。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沪战败绩、南京陷落。鉴于国难方殷、倾覆堪虞,1938 年夏,李树青“独排众议”,放弃深造与读学位的机会,绕道加拿大、欧洲,于 1938 年底返回上海。时吴景超服务于经济部,李树青即应其函召,取道越南,到重庆的经济部任秘书职,从 1939 年 4 月起服务了一年多。工作之余,李树青勤加撰述,有不少文章发表,多刊于《新经济》半月刊。据阎书钦统计,李树青先后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发文 17 篇,是《新经济》半月刊的重要撰稿人^[7]。

在经济部任职期间,李树青“深感在当时情势下,学人从政,只是徒劳精力。虽撰文呼吁,不仅效验毫无,久之且可能惹祸”^[8];“所见所闻,都使人感到在这种情势下从政,只有虚耗精力,浪费时间,于国于民,两无补益。因而渐萌退意”^[9],便于 1940 年夏天前往昆明,暂住清华人口普查研究所^①。不久,应潘光旦先生延聘,到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42 年聘为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8],从 1943 年起应吴文藻先生之邀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兼课^②。期间,结合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变动等问题,他运用制度学派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提出社会制度是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在《当代评论》、《新经济》半月刊和《自由论坛》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这些文章大部分编入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5 年出版的《蜕变中的中国社会》一书,“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10]③}。

时局的混乱给李树青先生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一些遗憾。1942 年春夏之交,在一次到郊外逃警报大半天之后,

① 李树青在经济部工作中发现孔、宋家族在香港参与贪污“国家稳定基金”,而许多军队里的前线指挥官从敌占区向内地偷运日本货发财,军用卡车变为私用,而士兵的待遇极差。为此,他三次向翁文灏部长提出严重申述,敦促他制止这种违法行为。申述无果后,他辞职到联大社会学系教书,尽管薪水只是在政府工作的三分之二^[9]。

② 在教学中,李树青可以较自由地批评政府的无制度及滥用权力。1940—1945 年间,李树青与潘光旦、费孝通一起为《自由论坛》、《生命指南》与《大国民》撰稿,传播民主,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这几份报纸后来都被迫关闭。陈立夫当教育部长后,更严密地控制知识分子,李、潘、费与陈立夫之间的冲突不断。1944 年 10 月,李树青收到警告信,信上直截了当地说,当局“砍大树”可能有些犹豫,可“割小草”不会有顾忌,如果李氏不闭嘴,就要承担一切后果^[9]。

③ 在社会学领域,李树青被称为“制度学派在中国的代表”,“用制度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蜕变中的中国社会”^[11]。谢泳^[12]指出李树青是继陈达、潘光旦、吴文藻等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之后,与费孝通、翟同祖、林耀华并称的第二代社会学家。另外,清华大学建校 90 周年时为 1926 年至 1952 年在社会学系任教的 10 位老教授挂像,其中就有李树青^[13]。

他回到寓所,发现几个房间在警报期间被劫掠一空,而“最可惜的是我抄写得整整齐齐,放在新购置的手提黑皮包内准备出版的二十几万字的稿件《中国土地问题调查报告》,也被偷去。后虽报警,终无下落”。为防止此类事情再度发生,他便把另外一部分分析中国农业与中国农村的稿件,经人介绍交重庆一家出版公司付印。不料,“虽订有合同,但交去后由于战时纸张困难,销路不定,搁置经年。纵使一再写信催问,始终不得要领。……次年我即休假来美,究竟这部稿件是否于复员前后在国内付梓,我再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14]。

平时,李树青先生还参与不少活动,如“战后经济问题座谈会”等,1942、1944年两次与联大同事联名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关于物价问题的意见^[15-16]。然而作为学人,李树青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他写道,“因就个人性格来说,当时政治上的云谲波诡,钩心斗角,朝秦暮楚,入主出奴,实难相容,如勉为之,不唯于事无补,枉费精力,甚且可能贾祸。不如埋头研读,追求真理、知识,日就月将,或有所成,即不成亦不致引起重大风波或麻烦,危及事业与生命”,“但总觉得,一人如卷入党派倾轧与斗争的漩涡中,则有如小舟进入滚滚激流,实难维持既定方针和贯彻崇高的理想”^[14]。

3 伊黎与魏尔万合著之《土地经济学》的中译

李树青于1940年10月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初到联大,除了讲授社会学课程,他还开设土地经济学课程。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从1940—1941年度到1944—1945年度,李树青开设了社会制度、社会变迁、乡村社会学、土地经济、土地问题等课程,他的课内容新颖丰富,逻辑性强,条理清晰,深受学生欢迎。土地经济类的课程安排一般是上学期开设土地经济,下学期开设中国土地问题^[18]。最初,“伊黎和魏尔万合著的那册代

表1 李树青有关土地经济方面的部分成果

Tab.1 Part outcomes of Lee Shu-Ching on land economy

序号	文献名	出处	年期
1	土地经济学(译著)	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4
2	<i>Social Implications of Farm Tenancy in China</i> (博士论文)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0
3	中国国民党的土地理论与现行土地政策	《民族》(上海)	1937, 5(2)
4	耕者有其田与地尽其利	《新经济》(半月刊)	1939, 2(12)
5	《土地经济学》(书评)	《新经济》(半月刊)	1941, 4(8)
6	田赋改征实物的商榷	《新经济》(半月刊)	1941, 5(10)
7	旧农业与新农业	《东方杂志》	1941, 38(16)
8	地租新论	《人文科学学报》	1942, 1(2)
9	纪念一位土地经济学者 魏尔万先生	《东方杂志》	1945, 41(10)
10	Pattern of Land Utilization and Possible Expansion of Cultivated Area in China	<i>Journal of Land &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i>	1947, 23(2)
11	The Heart of China's Problem, the Land Tenure System	<i>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i>	1948, 30(2)
12	Agrarianism and Social Upheaval in China	<i>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i>	1951, 56(6)

资料来源:作者收集、整理。

① 当时伊黎和魏尔万合著的《土地经济学》还有金海同的译稿。1943年第3卷第1期《人与地》的“编者附誌”写道,“以土地经济学权威闻名的本文作者伊黎(R. Ely)教授,他早年的著作《土地经济学要义》一书,早经介绍到我国,我们对他该不生疏。伊氏近又凭他在威斯康辛大学二十年的教学经验,跟魏尔万(G. Wehrwein)博士合著《土地经济学》一书(一九四〇年出版),内容丰富,堪称杰构。原书现经地政专家金海同君全部译竣,已交某书局付印,不久即可与国人相见。现本刊征得金君同意将有关‘人与地’的一章,抽在本刊先行披露,凡是渴望阅读伊氏名著的读者,当以先观斯篇为快!”^[17]由于当时的战况,金海同的译稿可能与前述李树青分析中国农业与农村的稿件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没有如愿出版、流传下来。

表威斯康星大学传统的权威课本《土地经济学》尚未出版,我只有自撰讲义,颇费时间精力。”^[14]第二年,他收到了魏尔万签赠的新书,“因土地经济是一项新颖的学识,在美亦系首创,我当即撰述了一篇书评,加以介绍。”^[14]在这篇发表在《新经济》半月刊1941年第4卷第8期上的书评里,李树青开头写道,“久在期待中的伊黎与魏尔万教授这册名著,终于在今年四月出版了”^[19]。在将新书与1922年的3卷本油印版《土地经济学大纲》、1928年合并且于1931年改订的《土地经济学》做了比较后,他详述了新书的主要内容,并在其中夹叙中国的土地问题和研究。

同时,他开始翻译这部名著,“暑假时即集中精力翻译《土地经济学》一书,期能早日完成,把美国这一门崭新的知识介绍给中国学术界”,并在1944年将该书作为“大学丛书”的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译者序”中,李树青交待了他翻译此书的动机——“译者的试想翻译本书,最早还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从魏尔万教授读书的时候。当时的动机有二:第一,因土地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国内专著无多,因而谈者每不免有误解之处。我们对本门科学具有兴趣的人,应该尽可能多介绍几本西洋名著,俾国内知识界与研究及讨论上,有所遵循。其次,魏尔万先生的谆谆教诲,多方指导,亦使译者不能不有所表达,以志其衷心铭感于万一。该时此书尚未出版,课室讨论还是用1931年改订过的油印本讲义。故翻译工作,未曾开始。”^[20]李树青一共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将该书翻译完成,“译者返国之翌年,本书出版。同年秋季,本人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斯门课程,适魏氏赠赐此书,也已寄至。于采为课本之余,即行着手翻译。中间因时局影响,教职关系,时译时辍,再加书内有许多僻字及难题,必须与魏氏通函商讨,亦延误时日不少。阅两年又四个月而全书始行脱稿。”^[20]

1942年9月,伊黎和魏尔万为李树青翻译的《土地经济学》写了序言。序言字里行间充满了喜悦、期待和祝福之情。他们写道,“最使我们感觉满意的是伊黎、魏尔万这册书要有中文译本出版了。尤其感觉快乐的,是我们对土地经济学毕生工作的结果,在一个对我们具有如此重大贡献的国度中,也能以致用。两位译者借着这个机会,对李树青先生表示其衷心的感谢,因为他,承担了这付艰苦的翻译工作,尤其是在这种危险与困难的时候。”同时,他们十分客观地告诉中国读者,“在阅读这册书时,中国的读者需要把某些情况,记在心里。这册书是为美国的读者写的,而所讨论的土地问题,也几乎完全限于美国及加拿大。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比较起来,美国还是一个婴孩。……至于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的想法、我们所建议的解决方案、以及由此所制定的土地政策,若能以应用于中国,则这册书对于中国人民必然是有用与有价值的。”他们又指出,“土地还有一些特性是普遍的,即在这种普遍的范围内,土地经济学者是用共同的用语。……也就是在研究这些人类关系上,才使我们共同倚靠着大地母亲,并使土地经济学成为一种社会科学。”“科学的结果必须变成行为,才能对人类有所裨益。土地经济学必须容纳到土地政策之中。美国刚开始转移到一个方向,使土地政策能以适合最近的发展。中国正处于转变的时期,利用中国安排的韧性与中国人民的坦白,我们的确以为,中国将根据其自然资源、制度、法律及传统,在经过其青年科学家的勤劳工作与踊跃领导,加以制定与修正,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为优异的土地政策来。李树青先生即属于这类青年科学家的团体。”^[19]

《土地经济学》的中译,有两个值得引以为傲的地方。第一,魏尔万教授在给李树青的信件里说,“就我所知的而言,你的将是在任何文字中的第一个译本!我们希望你能在最近的将来,把这本书出版。”^[20]第二,魏尔万教授特意为李树青提供了一份原著的详细勘误表,还在原著基础上插入了几个新的段落,“在勘误表内加上红色的括弧,用以说明作某些修改的理由。在有些地方,还对俗字俗语加以解释。这将帮助你从英文译成中文。这些新的资料,你尽可随意加以引用。或许你在序文里说,这些是由美国寄给你的;因此,你将有一个比原著更新与更好的译本!”^[20]

该书的中译得到了各方赞赏。汪经方在1946年第7卷第4期《中农月刊》上发表他对张丕介所著《土地经济学导论》的评论时指出,“最近李树青译美人伊黎(Ely)与魏尔万(George S. Wehrwein)合著的《土地经济学》,内容丰富,分析详尽”^[21]。另外,《土地经济学》的中译,可算是抗战期间中国经济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夏炎德在《中国抗战期间经济研究之成绩》一文中特意指出,“美人伊黎(Richard T. Ely)博士与魏尔万(G. S. Wehrwein)合著之《土

地经济学》(Land Economics) ,乃一九四〇年之新著 ,较旧著(伊黎与 Morehouse 合著)已面目一新 ,经由李树青氏译成出版。”^[21]熊复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亦言,“抗战时期 ,大后方经济学的研究也很兴盛。……以地政研究所为中心 ,负责主持土地与农业政策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该所还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伊黎和魏尔万合著的《土地经济学》等国外农业经济名著。”^[23]

4 1945年之后

1945年 ,李树青已在清华大学服务5年 ,便设想利用清华每任教5年可休假1年的规定 ,再度出国深造 ,以“完成尚功亏一篑的博士学位”、“重续7年前未竟的事业、待完成的学业”^[14]。时原来的导师魏尔万教授已逝世 ,另一位席博德教授也已退休 ,他便与仍在农业部任职的贝克尔通信 ,说明希望返美完成博士学位。贝克尔接信后 ,以马里兰州立大学的名义出面邀请 ,又安排从国务院获得旅费、解决食宿 ,使他可以安心到美国从事研究^[14]。1945年6月22日 ,他自昆明搭机飞往印度 ,在印度等待交通工具。等待期间 ,他遍访恒河流域的佛教圣地 ,写成一本书 ,1948年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以《天竺游踪琐记》为名出版。1945年8月31日 ,他从加尔各答登机 ,经南亚、北非越大西洋 ,于9月9日到达华盛顿。

在美国的最初两年 ,李树青在马里兰州立大学师从贝克尔研究土地利用与人口学。不久又在国会图书馆申得一间研究室 ,便如老鼠进入谷仓 ,日夜“蠹鱼似不出费钻研”^[24]。1947年 ,他转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课程 ,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的题目是 *Social Implications of Farm Tenancy in China*^[25]。之后 ,1952—1953、1953—1956年李树青在俄勒冈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任助理教授 ,1956—1958年任芝加哥大学东方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1958—1963年任东南密苏里州立学院社会学副教授 ,1963—1968年在南达科他大学任副教授、教授 ,1968—1969任戴顿大学教授 ,1969—1978任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 ,是美国社会学、社会问题研究学会和美国人口学协会会员 ,全国家庭关系理事会成员^[26]。1978年他从俄亥俄州立大学退休 ,由该校授予荣誉教授^①。之后 ,李树青“即行拟定一个写作大纲 ,试想趁空闲时间 ,一面把自己多年研求所得整理出一个系统 ;一面较详地介绍芝大社会学给中文读者”^[24]。不料撰写中忽于1983年患病 ,他便将所写14篇文章集成一本论文集 ,以《人性与社会 :人文社会学论丛》交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85年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李树青先生的介绍里指出 ,“李树青运用制度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变迁 ,提出社会制度是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又从社会学的传统、主题、方法等角度 ,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 ,应注重人与人的行为的研究。”^[2]高德增则指出,“我们看到 ,活跃于二战后国际科学领域中的学术权威 ,诸如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唐敖庆、朱光亚、王淦昌、王浩、牛满江、何炳棣、邹谠、李树青……等 ,很多人出身于西南联大”^[27]。

1982年秋天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 ,李树青教授回国探亲和讲学 ,访问了上海、南京、武汉、北京等地 ,与国内学者座谈 ,在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地方做学术演讲。在北京 ,他与潘光旦先生的长女潘乃燧教授同往八宝山公墓瞻拜了潘光旦先生的灵骨。在随后的几年里 ,他写作了一些回忆性的纪念文字 ,如纪念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的《“民主的堡垒”》 ,以及发表于台湾《传记文学》、香港《明报月刊》上纪念吴景超、潘光旦先生的文章等。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 [1] 刘书楷. 试论土地经济学研究[J]. 经济研究, 1987 (11) : 36, 71 - 76.
- [2] 白世俊. 忆省立第二师范学校[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丹东文史资料·第6辑[Z]. 丹东 : 自印, 1990 : 38 - 43.
- [3] 风笑天. 李树青[A].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M]. 北京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1 : 157.

^① 20世纪50年代初 ,李树青因学生签证过期而滞留美国 ,在当时“麦卡锡主义”推行反共排华政策的背景下 ,被美国政府怀疑倾向共产党 ,被判递解出境。几经申述 ,李树青才得以居留美国^[9]。

- [4] 李树青. 悼念业师潘光旦先生[J]. 明报月刊, 1984, 19(4): 63-68.
- [5] 李树青. 纪念杰出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J]. 传记文学, 1985, 46(1): 70-74.
- [6] 赵晚屏. 纪念吴景超及其他[J]. 明报月刊, 1985, 20(3): 108.
- [7] 阎书钦.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学者从政潮流与《新经济》半月刊的创办[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4): 26-37.
- [8] 方惠坚 张思敬. 清华大学志(下册)[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686.
- [9] 阎明. 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 社会学在中国[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226-227, 298.
- [10] 廖盖隆 等. 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3: 1703.
- [11] 杨雅彬. 近代中国社会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80.
- [12] 谢泳.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 47.
- [13] 李楯. 我与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A]. 曹保印. 精神历程: 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C].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209-217.
- [14] 李树青. “民主的堡垒”[A]. 北京大学校友联络处. 笛吹弦诵情弥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C].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8: 38-44.
- [15] 伍启元 李树青 沈来秋 等. 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N]. 大公报, 1942-05-17.
- [16] 杨西孟 戴世光 李树青 等. 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N]. 大公报, 1944-05-16.
- [17] 伊黎 魏尔万. 土地与人口[J]. 人与地, 1943, 3(1): 26-32.
- [18]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218, 251, 320, 353.
- [19] 伊黎 魏尔万. 土地经济学[M]. 重庆: 商务印书馆, 1944.
- [20] 李树青. 《土地经济学》(书评)[J]. 新经济(半月刊), 1941, 4(8): 188-191.
- [21] 汪经方 张丕介. 土地经济学导论[J]. 中农月刊, 1946, 7(4): 136-139.
- [22] 夏炎德. 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8: 198.
- [23] 熊复.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9: 300-302.
- [24] 李树青. 人性与社会: 人文社会学论丛[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
- [25] Fine, G. A. A Second Chicago School? The Development of a Postwar American Sociolog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390.
-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美国中国学手册(增订本)[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253.
- [27] 高德增. 鸿儒遍天涯[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99.